

农村青年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外卖骑手为例

■ 崔 岩 张 宾 赵常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 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聚焦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研究发现,中观层面的职业歧视遭遇、弱城市社会融入感与微观层面的职业压力等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宏观层面需在综合考量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基础上做好相应的引导和支持工作;中观层面,需重视返乡青年的归属感与返乡再融入问题;个体层面,有返乡意愿的青年需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做好返乡从业的心理调适。

【关键词】 外卖骑手 返乡意愿 乡村振兴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5.006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催生出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细致的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就业形态灵活多样,吸引了大量待就业人员。在乡村青年人口大量进城的背景下,新职业的出现使进城青年就业渠道日益多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就业模式。新职业从业人员规模日益庞大,其中以青年为主的外卖骑手是新职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口及潜在人口需求已达千万级,《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指出,外卖骑手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47%,八成来自农村^[1]。《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网约配送员就业报告》显示,在美团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中,有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外卖骑手总量的6.4%,2019年共有56.8%的外卖骑手选择外卖网约配送员工作实现本省就业^[2]。外卖骑手因其从业门槛低、工作方式自由灵活成为大量进城青年的职业选择,而与这一新职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相关的则是因为该职业群体的“脆弱性”^[3]带来的从业人员的频繁流动。骑手职业本身会增加个体的就业脆弱性,降低个体的职业稳定性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对于多数外卖骑手来说,这一职业只是作为职业生涯的一个阶段。高文珺在《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一文中指出,未来一年里有70.7%的调查对象表示会继续从事当前外卖骑手的工作,但在未来五年的规划方面

收稿日期:2022-07-01

作者简介:崔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张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赵常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

这一比例逐渐缩减,只有51.7%表示会继续从事骑手工作。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规划,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将自己开店、创业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尤其是在五年规划中,有其他相关规划的比例更高,还有小部分调查对象计划通过深入学习实现自我提升^[4]。

对这些将外卖骑手职业作为“过渡性”工作的群体而言,外卖骑手从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该群体增加收入、增长见识,引发其对今后从业的思考。这一“过渡性”职业从业结束后,在离开家乡工作的外卖骑手中,有71.1%认为自己未来很有可能或有可能返回家乡工作;在返乡的从业计划中,有71.1%计划创业或做小买卖,36.9%计划在当地就业,8.3%计划务农,1.7%选择不工作^[5]。有意返乡的农村青年对推动乡村振兴而言将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这些青年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天然纽带,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本、经营知识和技术优势积累,借助移动互联网提供的便利,迅速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还专门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7]。青年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有较强的吸收能力,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最宝贵的人才资源,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需要青年参与并承担积极角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职业群体的返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潜在返乡青年群体进行评估,以引导他们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服务。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农村青年进城是为了追求好的工作和高收入以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所面临的几乎是同样的“边缘化”问题,因而无法真正从身份上、更无法从心理上融入城市,加上就业选择有限,多以从事耗时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等,使得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流动人口的进城工作选择不具有可持续性。外卖骑手作为研究对象在职业身份和所处社会、生活环境方面较之传统流动人口如农民工和蓝领从业流动人口有所差别,但其本质仍是城市当中的流动人口、是最为普通的劳动者,其从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其他流动人口有诸多相似性,同时,也因其就业方式不同于传统就业形式导致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返乡意愿的研究可分为宏观制度、城市认同和融入、个人特征及就业等三个层面。在宏观制度层面,在我国城乡二元制度下,外来人口流入城市后在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方面都与本地居民存在较大的差距。长期存在的制度障碍弱化了农民工留城意愿,户籍制度下的“门槛效应”也会对流动人口的认同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8]。在城市认同和融入方面,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在社会中的融入感决定了个人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的能力^[9],对城市的适应、感受到的压力以及歧视等个体的主观心理因素都会对其留城意愿造成影响^[10]。如果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与流入地居民平等的市民待遇、获得与流入地居民相对接近的收入,他们将会有更强的社会融入感^[11],从而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返乡意愿会随之降低。在个人特征及就业方面,人力资本水平^[12]和工作满意度^[13]等与流动人口留在城市的意愿呈正相关,即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当前从事工作或者对进城工作经历满意度越高,就更愿意留在城市。

(二)外卖骑手职业困境与返乡推力

由于存在低门槛和高收入形成的“红利窗口”,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在吸引大量

新的劳动力涌入后整个行业的收入水平有所下降。这使得从事该职业的群体需要通过不断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在这种人力资源和个体高速流动的新职业生存业态下,离“心”运动是一种必然^[14]。劳动群体面临的职业压力是影响职业流动意愿的重要原因^[15]。当付出同样或者更多的劳动依然无法获得与以往相当的收入时,离“心”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离职的概率。外卖骑手在面临职业压力的同时还承受着多方的职业歧视。对北京市(外卖)快递小哥群体的风险压力研究发现,职业歧视与恶意投诉是(外卖)快递小哥的核心痛点,其作为外来流动人口,由于制度性安排和市场区隔的存在,使他们在城市中面临一定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倾向,在与客户和公司三者形成的关系中缺乏相应的话语权^[16]。在系统算法日益完善的背景下,配送时间被不断压缩,在高速度与高单量同收入挂钩的背景下,配送员的配送质量不断下降,进而加重了对该群体某种程度的歧视。依托信息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外卖平台的成长壮大并不等同于借助平台从业的外卖骑手的发展,外卖平台从业实质上仍属从事较低职业技能的行业,从业者发展空间不足,就业质量不高^[17],逐渐成为“困在系统里的人”,无法获得预期地位的提升,进而会降低留在城市的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意愿。

结合既有研究,本研究从宏观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政府服务支持和社会保障状况、中观层面的社会融入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职业压力三个方面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的返乡意愿进行讨论。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外卖骑手在政府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越未得到满足,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假设2:外卖骑手遭遇过职业歧视、对所在城市的融入感知越低,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假设3:外卖骑手在从业中面临的职业压力越大,越可能会产生返乡意愿。

三、变量测量与研究方法

当前有关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研究包括两种思路:一是研究已经返乡和已经留城的人群;二是研究处于迁移过程中的群体的返乡和留城意愿^[18]。从研究对象的选取方法可以看出,第一种思路是对完成状态的研究,属于事后分析,因此得出的返乡原因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并不能对青年返乡整体意愿进行全面评估,因此对整体青年返乡规模及其构成做出有效预估的作用有限,对返乡青年的整体工作布局无法提供有效参考。使用第二种思路开展的有关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研究采用的调查方式主要为深度访谈和抽样调查,但出于调查研究主题和内容的考虑,其研究对象相对广泛,调查区域以大城市为主,缺少专门针对特定群体返乡意愿的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

(一)数据来源和核心变量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和该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职业青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的调查数据。该调查为线上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45岁新职业青年。本研究选取农业户口并且以外卖骑手为主要职业的群体作为分析对象^①。如表1所示,该群体有效样本量为2758,其中男性占92.35%,女

^① 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年的年龄范围设定为18至44周岁,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年龄设定为14-35岁,国内关于青年的相关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年龄上限也通常在35到45岁之间。例如,黄志坚在《谁是青年?——关于青年年龄界定的研究报告》一文中指出,在界定青年企业家、青年文学家等时,一般年龄上限也在45至49岁之间。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是“75后”和“80后”人群,本文选取了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青年作为研究对象。

性占7.65%;年龄范围在18-45岁之间,平均年龄28.82岁;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为34.45%,高中或中专职高占44.9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20.59%;平均月收入约为5208.66元。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N=2758)

变量	取值	样本分布	有返乡意愿	无返乡意愿
地区	东部	55.11%	56.42%	51.70%
	中部	36.80%	35.56%	40.05%
	西部	8.09%	8.02%	8.25%
性别	男性	92.35%	94.13%	87.70%
	女性	7.65%	5.87%	12.30%
年龄	均值	28.82	28.76	28.96
	初中及以下	34.45%	35.41%	31.94%
受教育程度	高中或中专职高	44.96%	44.73%	45.55%
	大专及以上学历	20.59%	19.86%	22.51%
前一份职业	传统职业	99.02%	98.95%	99.21%
	新职业	0.98%	1.05%	0.79%
月收入(单位:元)	均值	5208.66	5178.29	5287.96
政府服务需求	均值	2.12	2.11	2.14
社会保障	有	74.98%	73.52%	78.80%
	无	25.02%	26.48%	21.20%
职业歧视遭遇	有	36.63%	38.82%	30.89%
	无	63.38%	61.18%	69.11%
社会融入认知	否	49.09%	43.93%	62.57%
	是	50.91%	56.07%	37.43%
每天工作时长(单位:小时)	均值	11.18	11.28	10.90
就业稳定性	可能	53.05%	57.97%	40.18%
	不可能	46.95%	42.03%	59.82%

2. 变量说明

本研究以农村青年外卖骑手是否具有返乡意愿为因变量,分析外卖骑手产生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返乡”的界定为农村外卖青年骑手返回其广义上的家乡,即返回其家庭所在区县,包括返乡不返村和返乡返村等情况。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研究对象工作地所属区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类型和月收入。调查对象所属区域指的是调查期间工作所在地,根据我国经济带的划分将其工作地所属区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分析不同区域间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差别。引入性别控制变量的原因在于样本中有近一成的女性外卖骑手,女性外卖骑手相较于男性青年外卖骑手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态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年龄范围上,本研究涵盖调查数据中所有年龄段的外卖骑手。受教育程度是评估职业选择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职高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三类,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前一份职业指的是研究对象在从事本职业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本研究将其分为新职业和传统职业两类。月收入为研究对象所选择的收入区间均值。

主要自变量由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中观层面的职业歧视遭遇和对城市社会的融入认知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从业压力构成。其中,政府服务需求根据研究

对象在“您希望政府为您做些什么”^①问题的选择项数对其政府服务需求进行测量。社会保障依据研究对象在五险一金、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补充保障方面的享有状况分为有社会保障和没有社会保障两类。遭遇职业歧视指的是研究对象在城市从业和生活中因其从事的职业而受到歧视。社会融入认知使用研究对象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进行测量,由研究对象是否同意“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地方)”的说法分为融入和未融入两类。每天工作时长计算的是从事外卖骑手这一职业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长。就业稳定性以失业可能性感知进行测量,根据研究对象对“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的回答分为有可能失业和不可能失业两类。

(二)研究方法 with 模型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依据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有无返乡意愿将其分为两类作为因变量。因为在一般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多为定距或定比变量,并且在理论上对其分布存在诸多现实条件下难以满足的假设,如需要满足正态分布、线性关系以及同方差性等条件;而 logistic 回归与一般回归模型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使用的因变量类型与一般回归模型不同,使用 logistic 回归可以对一个分类变量的不同类别发生概率进行预测,其因变量为分类变量,而自变量可以为各种类型的变量。本研究选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从事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P(y=1 | x_1, \dots, x_i) = \frac{e^{\varepsilon_i}}{1 + e^{\varepsilon_i}} \quad (3.1)$$

$$\varepsilon_i = a + \sum_{k=1}^K \beta_k x_k \quad (3.2)$$

$$\varepsilon_i = \ln \left(\frac{P}{1-P} \right) \quad (3.3)$$

上述 logistic 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是否具有返乡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该模型,假定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 P ,取值范围为 $[0,1]$,以农村青年外卖骑手是否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 x_1, x_2, \dots, x_i 为自变量,建立 logistic 回归方程,可得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为:

$$P = \frac{e^{a + \sum_{k=1}^K \beta_k x_k}}{1 + e^{a + \sum_{k=1}^K \beta_k x_k}} \quad (3.4)$$

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具有返乡意愿的概率表示外卖骑手意愿返乡的可能性,使用公式 3.4 计算出的数值表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具有返乡意愿的可能性,数值越大表示越有可能具有返乡意愿,反之则越不可能具有返乡意愿。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工具为 Stata16.0,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 2 所示。本次实证过程共建立了四个模型,其中,模型一是基准模型,模型二是在控制个体

^① 此问题选项包括:完善相应就业政策和服务、保障劳动报酬支付、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支持技能培训、维护劳动权益、提供法律援助和解决子女上学问题等。

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对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在中观层面的社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入认知,模型四是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微观层面的每天工作时长和工作稳定性的评估。通过对数似然比的变化可以看出模型得到了优化,即中观层面遭遇职业歧视、社会融入感知,微观层面的工作时长和工作稳定性都对个人返乡意愿的产生有显著的影响。

表2 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控制变量								
地区(东部为参照组)								
中部	-0.204** (0.092)	0.816	-0.192** (0.092)	0.826	-0.173* (0.093)	0.842	-0.217** (0.095)	0.805
西部	-0.017 (0.167)	0.983	0.009 (0.170)	1.009	0.057 (0.171)	1.059	0.071 (0.175)	1.074
性别 (男性为参照组)	-0.858*** (0.153)	0.424	-0.849*** (0.153)	0.428	-0.702*** (0.155)	0.496	-0.629*** (0.159)	0.533
年龄	-0.006 (0.007)	0.994	-0.006 (0.007)	0.994	-0.008 (0.007)	0.992	-0.009 (0.007)	0.991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或中专职高	-0.099 (0.099)	0.905	-0.091 (0.099)	0.913	-0.036 (0.100)	0.965	-0.019 (0.101)	0.981
大专及以上	-0.087 (0.124)	0.916	-0.075 (0.123)	0.928	-0.038 (0.126)	0.963	-0.033 (0.128)	0.967
前一份职业 (传统职业为参照组)	0.317 (0.471)	1.372	0.298 (0.461)	1.347	0.376 (0.447)	1.456	0.357 (0.446)	1.430
月收入对数	-0.231** (0.096)	0.794	-0.205** (0.095)	0.815	-0.185* (0.097)	0.831	-0.107 (0.105)	0.898
宏观层面								
政府服务需求			-0.034 (0.045)	0.967	-0.050 (0.046)	0.951	-0.054 (0.047)	0.947
社会保障 (无社会保障为参照组)			0.248** (0.104)	1.282	0.182* (0.106)	1.200	0.083 (0.109)	1.087
中观层面								
职业歧视遭遇 (未遭遇为参照组)					0.274*** (0.095)	1.315	0.221** (0.096)	1.247
社会融入认知 (融入为参照组)					0.698*** (0.089)	2.010	0.612*** (0.090)	1.843
个体层面								
每天工作时长 (单位:小时)							0.037** (0.018)	1.038
就业稳定性 (可能失业为参照组)							0.579*** (0.093)	1.784

(续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回归系数	几率比
常数项	4.158*** (0.871)	63.958	3.928*** (0.869)	50.815	3.234*** (0.881)	25.381	1.937*** (0.928)	6.935
LR chi2	43.13***		49.44***		123.01***		168.77***	
Log likelihood	-1605.9588		-1602.8008		-1566.0161		-1543.1387	
Pseudo R ²	0.0132		0.0152		0.0378		0.0518	

注: *、**、***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内为回归系数标准误。

模型一包含地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和月收入对数6个控制变量。在上述6个控制变量中,中部地区的OR为0.816,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相较于东部地区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更不倾向于产生返乡意愿。性别的OR为0.424,在99%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就性别而言,女性具有返乡意愿的发生比是男性的1/2。月收入对数的OR为0.794,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收入越高,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越不可能愿意返乡。年龄、受教育程度、前一份职业3个控制变量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宏观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研究对象对政府在包括就业政策、劳动权益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和个人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等对其返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的OR为1.282,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享有社会保障的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是不享有社会保障的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的返乡意愿的1.282倍。但在加入中观社会层面和微观个人职业压力层面的变量后,是否享有社会保障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假设1中认为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会影响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假设并不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对宏观层面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有较高的主观需求,但客观存在的差异对其是否产生返乡意愿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中观社会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职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入认知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OR为0.842,在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月收入对数的OR为0.831,在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社会保障的OR为1.2,在9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职业歧视遭遇和社会融入认知方面,遭遇过职业歧视的群体相较于未遭遇过职业歧视的群体,前者返乡意愿的概率比是后者的1.315倍($\beta=0.274, p<0.01$)。对工作所在城市(地区)社会融入认知低的群体,其返乡意愿发生比是社会融入认知高的群体的2.01倍($\beta=0.698, p<0.01$)。上述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2,说明城市社会的融入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发挥着推动作用。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职业压力等微观层面的两个维度,考察每天工作时长和就业稳定性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月收入对数和社会保障对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返乡意愿的影响不再显著。职业歧视遭遇的OR为1.247,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个人职业压力等微观层面,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每增加一小时,其产生返乡意愿发生比是原来的1.038倍($\beta=0.037, p<0.05$)。认为有失业可能性的群体产生返乡意愿

的发生比是认为不会失业群体的1.784倍($\beta=0.579, p<0.01$)。因此,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说明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职业压力对其返乡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新业态的发展带来就业形式的多元化,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吸纳了大量青年从业者。外卖骑手这一职业作为新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员既具有与传统流动人口从事的高强度、低职业技能职业相似的特征与问题,同时也因其产生于新技术背景之下而使得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研究主要从返乡推力的角度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该群体相较于传统流动人口表现出了较高的返乡意愿,但其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所不同。

首先,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青年乃至所有青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城乡等宏观制度环境相较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流动人口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表2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个体在宏观层面的政府服务需求和社会保障享有状况对个体返乡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应当注意的是,宏观层面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中部地区青年外卖骑手较低返乡意愿的现状则反映了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

其次,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的返乡意愿形成推力的因素是其在城市生活当中遭遇的职业歧视等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城市或从业所在地区的低归属感和在从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不断增加的职业压力。在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需要面对无法融入的城市社会和不断增加的职业压力时,主动或被动产生返乡意愿乃至最终选择返乡是部分青年外卖骑手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选择。

最后,本研究对农村青年外卖骑手返乡从业意愿进行的量化和质性分析发现,有返乡意愿的青年未来在当地就业为主,有10%左右的人表示从业方向为务农;访谈发现,即使倾向于在当地就业和创业的群体,其从业方向仍以涉农为主。这些潜在的返乡青年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的返乡人数,更是具有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本、能够为乡村的发展注入强劲活力的人力资源。对乡村而言,这些青年是潜在可预期的人力资源和财富、是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文化链接。他们在既往的工作经历中积累的来自城市生活的商业意识、现代观念和人脉资源等都有助于他们在返乡创业和就业过程中积累文化优势。对于部分返乡青年来说,返乡满足了他们对家庭生产生活的诉求,家乡是他们在追逐利益而付出身心代价后能够“软着陆”的最后“港湾”。同时,返乡青年具有自我实现与发展诉求,追求个性与挑战,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很多返乡青年利用在城市积累下来的资本回乡创业,实现自我价值。

综上所述,有必要对具有返乡意愿的外卖骑手群体进行多方面考量,对其从产生返乡意愿到发生返乡行为的转变进行判断,做好这部分返乡青年的创业、择业支持工作以及心理调适等,积极地吸纳这部分青年人返乡。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外卖骑手职业是农村青年进城务工首要的职业选择,但从事该职业的农村青年群体中超过七成有返乡意愿,有该从业经历的青年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返乡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青年群体返乡支持和引导工作,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宏观层面,需对返乡青年群体及其构成进行预估,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目前对农村外卖骑手青年的返乡研究处于其返乡的可能性阶段,对返乡群体的规模进行预估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还需对这一群体的其他特征、从业规划以及需求等方面做进一步分析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例如,农村青年外卖骑手存在一定的服务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较低的

社会保障享有状况等问题,应当持续推进相关政策的完善、满足返乡青年的合理需求,使其能够享受更为公平的社会待遇,从而有效吸引青年返乡。在返乡青年从业方面,做好返乡青年的创业支持工作,充分发挥这部分青年视野开阔与熟悉乡村现状的优势,支持其涉农产业的创业工作。这对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而言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第二,在中观层面,需做好返乡青年家乡归属感的培养与返乡再融入工作。农村外卖骑手青年返乡的地域和职业转换是个人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对于返乡青年而言,家乡生活存在潜在的“乏味感”。当最初的返乡想象和激情褪去,未曾想到的困难和局限将逐渐显现。例如,乡村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环境等与城市相比有区别,移居城市的吸引力便相对增加,返乡青年可能再次离乡,引发乡村的“二次空心化”。同时,较长时期的他乡、城市生活体验使得返乡青年面临家乡文化的再适应问题。因此,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而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积极鼓励返乡青年投身乡村建设,从大的政治制度环境方面给予优秀返乡青年更多的话语权,提高返乡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能力,尊重青年人的个性,进一步激发返乡青年在城乡交流、教育事业等方面的身份优势等有利于增强返乡青年对家乡的归属感和家乡社会的再融入。

第三,在微观层面,这些青年需做好返乡的角色与生活调适。未能在城市或非农行业获得所期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年群体在返乡后将面临较大的职业角色与生活调适问题。为此,返乡青年应当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做好返乡从业的规划并应对可能面临的新的从业压力等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2020 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 <https://doc.mbalib.com/view/abc74fa622d58ee5dc609f370d734b83.html>
- [2] 《新职业——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yiaowen/202008/t20200825_383722.html
- [3][17] 崔 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 [4] 高文珺:《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社会流动特点和影响因素》,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 [5] 朱 迪 王 卡:《网约配送员的社会认同研究——兼论“新服务工人”的兴起》,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 [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 [7]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载《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7期。
- [8] 王志涛 李晗冰:《身份认同、个人技能与农民工返乡意愿——基于CMDS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经纬》,2019年第4期。
- [9] Kaushik Basu. Group Identity, Productivity and Well-be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2013, (3).
- [10] 蔡 禾 王 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 [11] 崔 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 [12][18] 李 强 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2期。
- [13] 林树哲 张子涵 李碧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载《中国市场》,2019年第29期。
- [14] 陈 龙 孙 萍:《超级流动、加速循环与离“心”运动——关于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劳动的反思》,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
- [15] 梁玉成 张咏雪:《新技术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研究》,载《青年探索》,2020年第4期。
- [16] 廉 思 周宇香:《城市快递小哥群体的风险压力及疏解对策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载《青年探索》,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刘 彦)